



谈说今丛书

子通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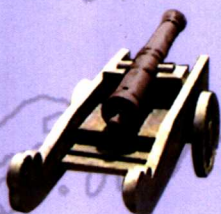
孙广权 孙建 ● 著

南皮香帅

——张之洞正传

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际者，要惟张香帅一人。此次军务，赖求其维持帮助，十居八九，惜其才疏而不密，又为政府及全权所压制，不能自由耳。

——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



中国华侨出版社

南皮香帅

张之洞正传

孙广权 孙建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文远

装帧设计/迷谷设计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皮香帅/孙广权 孙建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12

ISBN 7-80120-757-2

I. 南... II. ①孙..②孙.. III. 张之洞(1837~1909)—评传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01294号

● 南皮香帅

著者/孙广权 孙建

责任校对/秦真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640×960毫米 1/16开

印张/17.5

字数/18.5千字

印刷/北京银祥印刷厂

版次/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6000册

书号/ISBN7-80120-757-2/K·175

定价/28.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20号院3号楼

邮编:10002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张之洞像

目 录

第一章	初登仕途	3
第二章	跻身清流	21
第三章	移情洋务	51
第四章	强兵育才	91
第五章	运筹武昌	133
第六章	人亡政亡	183
劝学篇节录		215
附录一	张之洞年表	253
附录二	参考书目	274



第一章 初登仕途

张之洞 1850 年（道光三十年）十三岁时中秀才；1852 年（咸丰二年）十五岁时赴顺天府应乡试，中第一名举人；中解之后，1853 年癸丑科、1856 年丙辰科、1862 年壬戌科，均未中式；1859 年己未科、1860 年庚申恩科，皆因族兄张之万担任会试同考官而例应回避，未应考。直到 1863 年 5 月（同治二年四月），已经二十六岁的他，才在殿试中对策列一甲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从此开始步入仕途。

言及张之洞被点为探花，还有一段趣闻佳话。据张之洞为其房师范鸣醵之母所撰《范母余太宜人七十寿序》（河北人民出版社《张之洞全集·古文二》。以下再言及《张之洞全集》，均简称《全集》）中说，1862 年壬戌科会试，范鸣醵以中书舍人出任同考官，张之洞的试卷恰巧分在范鸣醵这一房。范极为激赏张的试卷，便竭力向上推荐，却被副主考大理寺卿郑敦谨批落，张之洞只得铩羽而归；次年举行恩科会试，范鸣醵以宗人府主事复受命为同考官，而张之洞的试卷恰恰又被分在范鸣醵这一房。范再次将张的试卷推荐上去，会试中式。在

接下来的殿试中，各位阅卷大臣皆嫌其“指陈时政，直言无隐”（《抱冰堂弟子记》），欲将其置于三甲之末，独有户部尚书宝鋈坚持将其置为二甲第一；及至两宫皇太后审阅，则将其卷提为一甲第三，点为探花。出榜之后，范鸣醵兴奋地作诗记之，铭感于心的张之洞亦和诗作答，二人在诗前小序中均言及此事。范序云：“上年会试分校，得南皮张香涛之洞卷，荐上，以溢额误落，深用怅悵。今岁复与校事，填榜得香涛名，仍出余房，众称异。比出闱，王少鹤奉常（内阁侍读王拯）贻书有‘此乐何止得仙’之语，属为诗记之。率成四律，谗诸同人末章，藉答奉常，兼示张子。时同治二年初夏望日（四月十五日）。”张序则云：“先生湖北武昌人。同治壬戌会试得余卷，亟荐被落，力争不得，愤悵泣下，更为延誉。今年癸亥恩科，余中式，仍出先生门下，喜极赋诗四首。”范诗中惋惜张之洞去年落榜句有云：“苦向闲阶泣落英，东风回首不胜情”；惊喜张之洞今年仍由己房高中探花，有句云：“适来已自惊非分，再到居然为此人；歧路剧愁前度误，好花翻放隔年春。”张之洞和诗中也充满感慨：“十八瀛州选，惟公荐士诚。不才晚闻道，因困转成名。”（《全集·诗集一〈奉和房师舍人范鹤生先生〉》）后来，张之洞莅临湖北，待范氏后人最善，盖报知遇之恩也。

师承儒家

张之洞自幼接受的便是儒家正统教育，十几位业师都是精修饱学之士。从张之洞的高祖父起，他家即属世宦人家、书香门第。受家庭的熏陶和师长的教诲，忠君爱国、尊崇先贤的

思想，深深植根于他的心中，主宰着他一生的言论与作为。

张之洞四岁时由附生何养源发蒙启智，九岁读完“四书”、“五经”，九岁开笔写文章。拔贡曾搢之，附贡张蔚斋，举人黄升三、王可贞、张肖岩、赵斗山，进士敖慕韩，都先后当过他的业师。

十二岁以后，张之洞从师贵州独山府知府韩超。韩超，字寓仲，号南溪，直隶昌黎人。家贫，励学刚毅，有大志，喜读韬铃家言。1834年（道光十四年）中副贡，历署贵州三角屯州同、独山知州。以练民团捕盗为黎平知府胡林翼所倚重，荐于巡抚蒋霨远，称其“腹有十万甲兵，胸罗二十一史，雄心远略，可为名将，亦可为名臣”，后官至署理贵州巡抚，旋以病还乡，1878年（光绪四年）卒，谥果靖。

此间，张之洞还曾就教于其父挚友、后来成为湘军名将的胡林翼。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胡林翼出任贵州安顺府知府，而张镆正任兴义府知府，两位同僚遂结为好友。张镆钦羨胡林翼的道德学问，便将张之洞送往安顺府衙住了半年，同胡氏子弟一起接受胡林翼的教诲。胡林翼非常器重张之洞的才华。一天，他得知张之洞中了第一名举人，写信给张镆：“闻贤四郎获解，吾与南溪相视开口而笑。”

张之洞离开胡林翼后，经常写信问候起居，胡林翼每信必复，张之洞则反复诵读，铭刻在心。1856年（咸丰六年），张之洞奉父命北上进京，准备应礼部试，行至武昌，去拜望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盘桓数日方行。张之洞十分服膺胡林翼敢为“武昌王”的胆识魄力，终身以其为楷模。后来，他任湖广总督时，着意重修了胡文忠公祠。他曾为总督府大堂亲拟一副对联：“西通巴蜀，南控荆襄，中有九江合流，形胜无双，楚尾吴

头一都会；内修政治，外诘兵戎，兼习四夷交涉，师资不远，前林后胡两文忠。”这下联中的“师资不远，前林后胡两文忠”，“前林文忠”指的是曾于1837年（道光十七年）出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后胡文忠”即为胡林翼。胡林翼只当过湖北巡抚，并未任过湖广总督，但卒后特旨诏赠总督衔。后来，他又曾写过题为《谒胡文忠公祠》的两首七律，其中有云“敢云骛钝能为役，差幸心源早得师”，其钦服仰慕之情、步师后尘之意，俱见诸笔端。

据徐珂《清稗类钞·饮食类》载，年轻时的张之洞也曾贪杯，且大醉之后好为狂言。当族兄张之万以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的消息传来，使他受到极大刺激，慨然曰：“时不我待矣！”从此，他发奋读书，不再沉湎于杯中之物。张之万，字子青，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累官河南学政、礼部侍郎、江苏巡抚、浙闽总督、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1865年6月（同治四年五月），张之洞在悼念发妻石氏的诗中曾自承：“酒失常遭执友嗔，韬精岂效闭关人？今朝又共荆、高醉，枕上何人谏伯伦？”（《全集·诗集二〈悲怀——悼亡室滦州石氏〉》）道是昔日常因酒后失态而遭夫人嗔怪，如今自己又与行侠任义如荆轲、高渐离的朋友们酩酊大醉，又有谁再在枕上劝谏我这个嗜酒如刘伶刘伯伦的酒徒呢？为了警醒自己，他曾作《傲醉篇》（《全集·诗集一》），诗云：“圣徒贵清明，足使神仙浊；杰士尚沉毅，醉多必疏略。庶厉道力坚，勿为麴蘖夺”，又云：“笑谢王无功，独醒有至乐。”王无功即隋代的王绩，文中子王通之弟。据《新唐书·王绩传》载，他家有奴婢数人，专管春秋两季酿酒。他乘牛车出游时，如遇酒肆，常留

饮数日不归。与朋友交,对酌以酒;有人以酒相邀,立即前往,能“饮五斗不乱”。唐高祖李渊武德元年(618年),他以隋朝原任官职待诏门下省,官衙按旧例每天供给每位官员三升酒。有人问他:“待诏如何?”他答道:“良酝可恋耳。”侍中陈叔达闻知此事,便命人每天供他一斗酒,时称“斗酒学士”。太宗李世民贞观(627—649年)中年,他得知太乐署史焦革的家里善酿美酒,便请求去太乐署任乐丞。吏部认为,以高就低不合官制,便没同意。他一再强调自己这次要求调动“有深意”,最终竟如愿以偿,得以天天畅饮焦革家的美酒。焦革死后,焦妻依旧为他“送酒不绝”。一年后,焦妻继逝,他叹道:“天不使我酣美酒耶?”竟弃官而去。张之洞在诗中称“笑谢王无功,独醒有至乐”,表示自己今后绝不学王绩的长醉不醒,认为警醒做人,乃为至乐。独醒,在古代文士看来,是一种不同流俗的孤高和明卓。《楚辞·渔父》:“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杜甫《赠裴南部》:“独醒时所嫉,群小谤能深。”明·刘基《述志赋》:“楚屈原之独醒兮,众皆以之为咎。”而宋代曾敏行自号独醒道人。历代先贤的种种表述,无不潜移默化着张之洞的心灵。

对历代先贤哲圣,张之洞既尊仰他们彪炳千秋的功业,更敬佩他们刚直纯正的人品,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为他们修葺祠堂,以表师从之心、崇敬之情。

1865年(同治四年),他与直隶同乡李鸿藻、张佩纶等在京师南城下斜街创建畿辅先哲祠,供奉自黄帝以来的1485位乡贤的木主,分先哲、先贤、名宦、忠义、孝友、儒林等几大类,并收藏了众多乡贤的书画手迹。

在广州,他创建三君祠,祭祀虞允文、韩愈、苏轼三位贤人;建濂溪祠祭祀周敦颐,并寻得周敦颐磨崖题辞一帧,悬于祠内;又建七公祠,祭祀唐代宋璟,明代王守仁、韩雍,以及吴兴祚、松筠、阮元、林则徐等本朝贤达;又为关天培、张国梁二位抵御外侮的名将建立祠堂;又于越秀山阮元祠内附祀卢坤、钱仪吉两先生;又在广雅书院内建岭学祠,祭祀历代粤人及官粤、游粤诸人之学行可为师法者。

在武汉,他于两湖书院内建楚学祠,祭祀楚人及官楚、游楚之学行可为师法者;又建罗泽南专祠和彭玉麟、杨岳斌二公祠堂;又将武昌城内已凋敝不堪的杨宗仁、胡林翼二公祠堂整修一新;还在巡抚衙署内建十贤祠,祭祀诸葛亮、杜预、刘宏、陶侃、柳公绰、张九龄、岳飞、孟珙、卢象升、胡林翼等历代贤达。

家庭的熏陶、师长的教诲和历代贤人的榜样,使忠君爱国、清正廉洁、尊崇先贤的思想深深植根于张之洞的心中,主宰着他的言行,使其能在晚清腐败已极、糜烂不堪的官场里,保持了出污泥而不染的洁净清白之身。

学兼汉宋

张之洞自幼所受的儒家传统教育和忠君爱国思想的熏陶,决定了他在学术思想和研究活动中走的必然也是儒家正统之路。

在经学研究方面,他崇尚古文经学,摒弃今文经学。

古文经指秦以前用古文书写而由汉代学者加以训释的儒

家经典。古文经学盛行于东汉。清代学者继承古文经学家的训诂方法而加以条理发明,用于古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研究,有较大成就。以惠栋、戴震、钱大昕等人为代表的“乾嘉学派”便以汉儒经注为宗,推崇东汉许慎、郑玄之学,对古籍及史料整理有较大贡献。

今文经指汉代学者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传述的儒家经典,大都没有先秦的古文旧本,而由战国以来的学者师徒父子传授,到汉代才一一写成定本。今文经学对西汉封建制度的巩固起过作用,到清代曾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变法主张的重要理论根据。

今文经学最重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所撰的《公羊春秋传》,康有为即是今文经学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平生最恶公羊学,每言及此,必竭力指摘其非。戊戌变法时,他与康有为在变通成法、富国强兵等方面均能达成共识,但他对康有为依据今文经学《春秋》公羊说而制定的托古改制变法理论却极不赞成,曾劝诫康有为不要在《强学报》上采用“孔子卒后记年法”,却被康有为毫不含糊地拒绝了。戊戌政变后,他借古讽今,写过一首题为《学术》的七绝,以汉代大儒、古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刘歆力持左氏《春秋》的经历,影射时弊,诗云:“理乱寻源学术乖,父仇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葵麦,只恨荆榛满路栽。”(《全集·诗集四》)诗后自注云:“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他将时局大坏的因由紧紧地套在了今文经学家的头上。

张之洞虽然摒弃今文经学,但并不反对今文经学家倡导

的“经世致用”说。《大清畿辅先哲传》说他“洽闻强记，淹贯群书，尤究心经世之务”，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也说他“少务博览，尤究心经世之务”。他这种学风的形成，与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候是息息相通的。清代，不论是研究古文经学的代表人物顾炎武、惠栋、戴震，还是研究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庄存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尽管他们在学术上各立门户，但在主张“经世致用”方面，却极其一致。所以，张之洞极力倡导“读书宜读有用书”（《全集〈轺轩语一·语行第一·讲求经济〉》）。而他竭毕生精力办洋务、办实事、办实业的种种举措，正是他这种务实学风的真切体现。

自宋、明出现程（颢、颐）朱（熹）和陆（九渊）王（守仁）两派理学以后，学术界便开始了宋学与汉学之争。汉学，即以古文经学为代表的汉儒考据训诂之学，学风质朴无华，故又称朴学，但失之烦琐支离；宋学，即以理学为代表的宋儒性命义理之学，其学阐述义理，兼及性命，精微博大，其流弊则为虚妄空疏。

清代自康熙帝起便极力推崇理学，将朱熹配享孔庙，以朱注“四书”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入清以后，汉学、宋学之争互有消长，难分伯仲。张之洞却“学兼汉、宋，汉学师其翔实而遗其细碎，宋学师其笃谨而戒其空疏”（《抱冰堂弟子记》）。所以，他对宋学也并不排斥，只是将汉学看作学术之本，说“倘不知本源，即读宋儒书，亦不解也”（《全集〈轺轩语一·语言第二·宣讲汉学〉》），故而王树枬在《〈张文襄公全集〉序》中说“幼负盛名，制行遵宋儒，而经史考订则一守汉儒家法”。

搞学术研究，张之洞主张破除门户之见。他说，“近世学

者,多生门户之弊”,“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大要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汉学岂无所失,然宗之则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学非无所病,然宗之则可以寡过矣”,“使学者于两家有所慕而无所党,不惟汉、宋两家不偏废,其余一切学术亦不可废”(《全集·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故此,张之洞读书不钻牛角尖,不进象牙塔,多从实际出发;行文作诗没有腐儒气,没有高僧气,也多从实地考虑。徐珂的《清稗类钞·经术类》记载了他读书、作诗的两个小故事,正说明了这一点。他读《易经·系辞》,其中有句云“金曰从革”,很不好解,诸说纷纭,难惬人意。张之洞认为,“从革”当为“纵横”之误。他说《易经》流传久远,“纵横”二字已被蠹虫蛀残,失去偏旁,“横”字右侧的“黄”字也被蛀得残缺不全,字形才近似“从革”,倘若恢复原字,读作“金曰纵横”,不是很好解了吗?他还曾对人说,“孤篷听雨”,倘若入诗,自然是妙境,如若真的身临其地,定然会觉得很狼狈了。

不慕虚名,自有见地,正是张之洞学兼汉宋的一贯表现。

擢拔人才

为了实现忠君爱国、经世致用的抱负,张之洞自然想干一番大事业,这就需要为国家物色大批人才。他认为:“用人养才,尤为国家根本之计。”(《全集·奏议七十〈遗折〉》)他为官四十余年,始终极其重视擢拔人才,也的确从方方面面为国

培养了大量人才。

张之洞擢拔人才,有自己独特的一套标准:“一曰至诚,

二曰秉公,三曰虚心,四曰破格,五曰器使,六曰节取,七曰造就。”(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这七条标准当中,他最重视的是“破格”。1886年11月21日(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他正在两广总督任上,为开发海南,特上《密陈琼防人才片》(《全集·奏议十八》),强调“必破格而后可言得人,必得人而后可言辟土”。1867年8月11日(同治六年七月十二日),张之洞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浙江士民素来仰慕他的声名识见,称“今年张香涛以名士来浙主试,可谓乡邦之幸”(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为给国家选拔人才,他“最勤于搜遗,乡试卷全阅,小试卷十阅其七,得人最多……所录专看根柢、性情、才识,不拘于文字格式,其不合场规文律而取录者极多”,凡文章本无根底词华而号称六朝骈体、以纤仄拗涩字句强凑成篇者,必定令其落选(见《抱冰堂弟子记》)。这年乡试得经学、史学、词章、经济等各科知名之士五十余人,其中有后来曾任陕甘、两广总督的陶模,外交家袁昶、许景澄,以及著名学者孙诒让、沈善登、钱丙奎、沈镛经、王棻、谭廷献等。

1873年9月22日(同治十二年八月初一),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所选士子多超绝之士,宋育仁即为其一。宋在清末曾出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是蜀学会的发起人,后任成都国学院院长兼四川通志局总纂。此外还有杨锐、缪荃孙、王懿荣、毛席丰、范溶等。对这些学生,张之洞备加关怀,着意栽培。他尤其喜爱杨锐,称其“才英迈而品清洁,不染蜀人习气。颖悟好学,文章雅贍”,为“蜀士一时之秀”(《全集·书札一〈致谭叔裕〉》)。无论是抚晋,还是督粤、督鄂,张之洞均令杨锐追随左右,成了他须臾不可稍离的得力助手。杨锐,字叔峤,四川绵竹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以举人授内阁中